

## 中國亞波羅與香港神學界之九七危機\*

羅秉祥(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

**大陸之宗教熱與馬其頓呼聲** 有關中國大陸民間之宗教熱，及知識分子中的宗教文化研究熱之方興未艾，已有好些人報道過。筆者這幾年都常有機會到大陸作學術交流，認識不少在大學任教或在研究機構工作的學者，對這個宗教文化熱感受更深。

在不久前，筆者便參與了大陸某大學的暑期宗教與文化研討班中的講學。這研習班由該大學與香港某研究機構合辦，為期六天，講師分別來自該校教授及香港三位學者，內容除了兼顧中國的儒釋道三教外，重點是落在基督教上，正式報名參加的約有一百四十人，絕大部分都是大學講師、研究生、大學生、及文化工作者(如出版社編輯)，來自大陸各省市。他們自掏腰包及長途跋涉，就是為了要參加這個密集課程。筆者覺得他們聽課非常投入，反應熱烈，每次講課後都提出很多問題，希望有進一步的了解。

在這個研討班期間有兩個晚上是綜合討論，讓學員與講師有更多機會溝通。其中有一位學員起立發言，第一句話便是：「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到這個研討班來，是因為對我們現時的精神狀態不滿意。」這句話扼要地道出大陸許多知識分子的精神空虛，及對宗教有求知欲

\* 本文轉載自《時代論壇》第419及420期(1995年9月10、17日)。

的產生原因。

總而言之，大陸中許多大學生、研究生、教授、及出版社編輯都對宗教及宗教文化(特別是基督教)很感興趣。知識人想多讀一些有關基督教的書，出版社中也有編輯想多出版一些與基督教文化有關的書，四處搜羅有分量的作者。這些對基督教的興趣及求知，儼然是一個馬其頓的呼聲。

神的工作很奇妙，回應這個馬其頓呼聲的，並不是大陸的教會或神學院，而是一批在大學任教或在研究所工作的學者，於是便有中國亞波羅的出現。

由於這十年來大陸有些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神學感興趣，有好感，於是便開始了大規模地把西方神學名著中譯，及著述一些介紹基督教神學的作品，以提高國人對基督教的認識。筆者稱這一批人為「中國的亞波羅」。

**中國的亞波羅** 按照《聖經》使徒行傳十八章24-28節所記載，亞波羅是一個出生及成長於埃及亞力山太的猶太人。亞力山太是第一世紀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文化學術中心，而亞波羅也是一個有學問、口才、文化教養，及博學善辯的人。他有豐富的舊約《聖經》知識(舊約的七十士希臘文譯本便是在亞力山太進行譯著)，在主的道上受過訓練，熱心把耶穌的事向別人講解，所以便從亞力山太北上到以弗所巡迴傳道。只可惜他停留在約翰的水禮(他很可能曾和施洗約翰的門徒有來往，但從未接觸過耶穌的門徒，與以耶路撒冷為首的主流教會沒有來往)，對神透過耶穌的啟示認識雖然正確，但不充分。於是，當百基拉和亞居拉夫婦在以弗所會堂中發現他的講論雖然娓娓動聽，但有毛病，便馬上接他到他們家中長談，向他更詳細，更完整和更準確講解上帝的道。

中國的亞波羅，也是出身於學術名門，受訓於或聚居於北京及其他文化學術中心，有些更在歐洲大陸取得博士學位。他們有學問、口才、文化教養，會寫文章，並且有豐富的神學知識，但這些神學知識卻不是由教會或神學院而來。他們出於各種不同原因仰慕基督教，也熱心於提高國人對基督教的知識水平，所以大量翻譯西方神學典籍及著述介紹基督教的書。但是，由於一直以來都與教會來往甚少，筆者恐怕他們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雖然也正確，但不充分。他們常埋首於神學鉅著，卻很少看《聖經》；他們常與其他學者來往，但沒有教會生活；他們講基督教神學，但卻抽離於基督教信仰群體；他們熱愛神學，但不一定熱愛神；上帝是他們研究思維的對象，而未必是禱告敬拜的對象。

在大陸這些熱心的亞波羅人數不少，而成就最傑出及較為港人所熟悉的便是劉小楓先生。

劉小楓今年才三十九歲，四川人，大學時學外語，再到北京大學修讀哲學，得碩士學位，曾任教深圳大學，及後到瑞士巴塞爾大學進修神學，二年前得神學博士學位後便來港工作。他身兼二職，既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也任職於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的學術研究部。他已出版了著作多本，其中的《拯救與逍遙》(1989)清楚流露出對基督教仰慕之情，《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1990)更是直接介紹當代神學之作，兩者都對大陸知識分子有一定的震撼。

劉小楓更大的影響力並不在他個人的著作，而是他參與的大規模西方神學中譯的計劃。由於他早年就讀於四川外語學院，所以認識了許多熟諳英、法、德、俄語的翻譯人材，再加上他在深圳和北京學術界交遊廣闊，和他個人的作事魄力，所以他參與推動了幾個翻譯計劃：一、《當代歐陸宗教思想系列》，全套十二本，自兩

年前至現在已出版了八本，先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最近也在國內某出版社出了簡體字版。二、《歷代基督教思想學術文庫》，全套暫定約八十本，再分為古代系列、現代系列及研究系列三類。先由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出繁體字版，再由大陸兩家大出版社出簡體字版；自九四年推出後，在香港現已有七本書出版，並計劃繼續以每年十本書的速度出版。三、《二十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1991)包含一百十二篇西方神學家的作品，洋洋一百四十五萬字，在大陸出版。這些工作，是自從《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以來最龐大的西方神學名著中譯計劃。

劉小楓也主編兩本討論基督教的期刊：一、《基督教文化評論》，是大陸第一本完全討論基督教的學術期刊，自九〇年出了第一期後，斷斷續續，最近出了第四期，作者主要是大陸學者。二、《道風：漢語神學學刊》，由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出版，自去年夏復刊後，最近已出了第三期，作者仍是以大陸學者佔多。

此外，劉小楓也組織了一些活動。前述的暑期宗教與文化研討班今年已是第二屆，反應比去年更熱烈。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的學術研究部最近也「升格」為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劉小楓任學術總監，楊熙楠為執行總監，日後更會大展拳腳。

**另一群默默耕耘者** 其他值得我們注意的中國亞波羅還有：一、何光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編《宗教與世界》叢書，已出版了二十本書，其中不乏介紹現代基督教思想的一流著作，他個人也是麥奎利(John Macquarrie)及蒂利希(Paul Tillich)迷，中譯這兩個人的著作多種，也著有《多元化的上帝觀——二十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概覽》(1991)，及參與《基督教文化評

論》的編輯工作。二、卓新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德國慕尼黑大學博士，編寫了《基督教文化面面觀》(1991)，著有《聖經鑒賞》(1992)，《尼布爾》(1992)，《基督教文化百問》(1994)。三、唐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編了《基督教史》(1993)，著有《西方文化與中世紀神哲學思想》(1992)。四、趙敦華——北京大學哲學系副系主任，及即將成立的宗教學系副系主任；歐洲魯汶大學哲學博士，最近出版了洋洋五十萬字的《基督教哲學一五〇〇年》(1994)。除了這四位外，還有許多其他學者也在作類似的介紹基督教的工作，所作的也很多，範圍也很廣泛，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連商務印書館也出版了不少基督教著作的中譯，如《耶穌傳》(David Strauss, 1981, 1993)、《宗教改革史》(1992)、《英吉利教會史》(1991)及《路德傳》(1989)。

這一批學者的默默耕耘及驚人產量，大大提高了大陸讀書人對西方宗教的知識水平，使他們對於基督教在西方文化所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不再蒙昧封閉，一無所知了。

**基督教進入學術流** 在香港及台灣，一般來說，基督教的書籍和其他書籍在出版和發行上是壁壘分明。基督教出版社通常只出版基督教書籍，基督教書局也通常只售賣基督教出版社的產品，而非基督教出版社及書局也通常不理會基督教著作。這種楚河漢界的現象，在現時的中國大陸卻破除了；很多很好的西方神學著作是由國營的大小出版社出版，放在一般書店中售賣。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大陸根本就沒有基督教書局；第二、大陸教

會及神學院中幾乎沒有人有能力去從事神學著述，極少數有能力的人又要負責極其繁重的牧養或行政工作而分身不暇。第三，大陸出版界中有少數既有眼光又有膽識的編輯，為了要協助讀者全面認識西方文化，願意推動介紹基督教思想的出版工作。第四，大陸的宗教熱促使基督教書籍極其暢銷，出版這些書能為出版社賺錢。因為這四個原因，再配合中國亞波羅的出現，便使到近年來，基督教思想迅速在教會以外傳播出去，在學術界中也佔有一席位，進入學術界的主流。

**香港神學界之九七危機** 本來嘛，中國亞波羅是中國大陸的事，與香港神學界沒有太大關係。但是，在不足兩年之內，香港便要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將會承受從大陸來的文化衝擊；香港人也需要調整思想，要放眼全中國，不能自囿於香港。筆者估計，假如香港神學界繼續一如以往，在九七年後將會面對以下四個危機：

一、對中國失去神學發言人的機會——香港雖然有密集和精銳的神學人才，但在九七年之後，假如目前趨勢不變，香港的神學工作者將會突然發現，他們會被一大群大陸的基督教活躍研究者所包圍。他們著作等身，我們卻很少著作；他們能打入學術界主流，我們卻自限於教會之內。如果九七年後大陸的宗教文化熱還不退溫的話，渴慕基督信仰的知識分子將會繼續向劉小楓等亞波羅問道，而不會求教於香港神學界。於是，香港神學工作者雖然精銳，也會白白失去了對中國作為神學發言人的機會。

二、在香港的神學發言人的地位也岌岌可危——香港的信徒中不乏求知欲高的人，他們會慢慢發現，神學的新思潮是要在香港的神學院及基督教書局以外才能找

到，於是便饑渴地去啃中國亞波羅所帶來的著作，而香港的神學工作者對他們的影響力便日減。香港的神學界可能有一主觀願望，希望香港和大陸是河水井水之分；可是，這明顯地是不切實際的。

在香港，很容易便買到大陸所出版的書籍；再者，劉小楓所帶來的很多著作也是先在香港出版。劉小楓現已定居香港，他和楊熙楠的緊密合作，好像是雙劍合璧，威力無窮（熙楠抓到資源和香港的出版渠道，劉小楓則抓到翻譯人材和大陸出版關係）。來自道風山上的密鑼緊鼓聲，擊碎了香港平原的平淡神學氣氛，香港神學界在未來將會有不少競爭（但願都是良性的，而不是如哥林多教會中分門結黨，分為保羅派、亞波羅派，彼得派，互相貶斥，參林前1:12）。香港的神學工作者如不抖擻精神，連在香港也可能要靠邊站。

三、被迫處於被動狀態——香港神學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場空前龐大的介紹西方神學思想運動正在教會及神學院外進行。我們雖然明知這些神學典籍的譯者絕大部分都並非基督徒，他們雖然語文能力可能會很高，但神學素養卻參差不齊，香港的神學工作者也只能很無奈；自己因財力、人力、及時間限制而不去作的事，不可以禁止別人也不能去作。

於是，香港的神學界便不再啟導神學思想風氣，失去領導地位；而只能被動地等待，看看信徒讀了這些中譯及著述後有何問題出現，看看堂會牧師有沒有投訴求援，才再決定如何回應。再者，香港的神學工作者絕大部分都是在英美受訓，而劉小楓是就學於德語神學界，他所組織的翻譯工作不少是直接從德文中譯，有些更是連英譯本都沒有的。於是，香港的神學工作者也只能被動地觀看，難以評論這些中譯的得失。

四、未能把握時機向大陸知識分子作宣教工作——

來自大陸知識分子的馬其頓呼聲雖然響徹雲霄，香港大部分的神學工作者仍只能愛莫能助，有心無力，眼巴巴坐失良機。因為(i)、香港的神學工作者大都著述貧乏，能夠爭取到教會以外的出版社出版就更是鳳毛麟角。(ii)、香港的神學工作者雖然不乏專家，但不少缺乏深厚的一般文化教養，所以和文化界、學術界的人對話不容易接上話題。(iii)、我們的普通話差勁；已經缺乏著作來流通神州大地，我們就算有機會面對面碰上慕道的大陸知識分子，也因為普通話不良而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而中國的亞波羅卻沒有這三個問題。

上述的四個危機，是就香港神學界大體而言，當中有個別例外的出色神學工作者，是自不待言。筆者的擔憂是，在九七之前兩年不到的時光中，香港的神學界如繼續固步自封，弱勢持續，上述的四個危機便會在九七後冒現，使我們手足無措。

**如何扭轉弱勢？** 要化危機為轉機，筆者愚見有四：

一、拓展新視野——神學工作的首要任務固然是為教會服務，但也不僅是為教會群體而作，也應該為教會外、學院中饑渴慕義的人而作。大陸的文化界和學術界不乏仰慕尊敬基督教的人，香港的神學工作者不應囿於教會圈子，有一部分人也要有文化承擔；要步出教堂，走向學堂。教會的信徒也應該鼎力支持這種文化宣教工作，不要怪責他們不務正業。(所以，筆者希望《時代論壇》的讀者能對你們所認識的神學院及神學工作者，在這方面多些鼓勵。)

二、增加廣闊文化修養——要和文化界和學術界其他學者對話，與大學生和研究生溝通，神學工作者必需具有深厚的通識教育。假如神學工作者能懂多國語言，

但讀不懂中國古代《史記》和《離騷》的古文；或對古代近東文化或希臘羅馬文化如數家珍，但對悠久的中國文化感到格格不入或只略懂皮毛，又或任由信仰被其他學科所圍攻(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但不會主動出擊去指出其他學科或思想的困境或局限，都很難在中國文化界和學術界中爭一席位。

劉小楓之所以能在大陸知識分子中知名度很高，部分原因是因為他並不把自己自限於狹隘的神學領域，而也兼顧文學和哲學。(例如在《拯救與逍遙》中他是透過討論屈原、陶淵明、曹雪芹、魯迅、莎士比亞、杜思妥也夫斯基、卡夫卡、卡繆、艾略特等來討論基督教信仰。)再者，他除了從事神學事業，也從事文化建設，他曾編著一些討論中國文化及美學的書籍，而現在他也是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內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與其他中國學者並肩作戰從事文化事業。

三、增加有深度的著作——香港的神學工作者很忙碌，除了教學，培養教會棟樑，還要兼顧行政、輔導、牧會、講道、主領講座、佈道會、培靈會、為不同的雜誌刊物寫文章等，對於香港教會，可謂苦勞功榮俱備。可是，為了要騰出時間，寫出鉅著，作獅子吼，香港有一部分的神學工作者需要婉拒很多教會及機構的邀請。只有著書立說，才能在遼闊的神州大地發生影響力。假如這點都作不到的話，至低限度，香港的神學工作者要對中國亞波羅所帶來的中譯和著述作中肯的評論。

在譯述方面，假如是好書好譯，可加以推崇；假如是好書壞譯、或壞書好譯，便要不吝批評。在著作方面，這些亞波羅把基督教神學當作知識研究的對象，完全與教會生活脫離，他們所介紹的基督教思想，對教會信徒又會有何衝擊？香港神學界需要有人出來作百基拉和亞居拉，糾正亞波羅的偏蔽。於是，一方面，教會信

徒能知所去從；另一方面，現時略為沈寂的神學氣氛也可打破，使香港神學界生氣蓬勃，在切磋討論中邁向新生。這樣，對於教會來說也是莫大福氣，正如當亞波羅受百基拉和亞居拉夫婦指導迷津之後，保羅視亞波羅如親密戰友，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sup>1</sup>

四、積極面向神州——九七年之後的形勢是，大陸的文化學術與香港的文化學術是互相影響的，問題的關鍵是哪方的影響力較強，能佔上風？我們切勿低估大陸龐大的學術界之影響力。再者，香港的神學工作者也應該爭取機會到大陸講學及出版著作。香港浸會大學及中文大學內的神學工作者在這方面就更加責無旁貸，因為香港和大陸兩地的大學有非常頻繁的學術交流活動，可以在學術界中暢談基督教文化；這兩所大學中的神學工作者，也許可以與神學院中的神學工作者略有分工。

總而言之，香港神學界這幾十年來培養及儲備了那麼多一流神學人才，難道只是為了香港教會和散居海外的香港信徒？也不為了中國？在九七年後香港已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知識界中的基督教文化熱，難道與我們不相干？聽聞今夏香港有好幾所神學院都有新華人教授加入，既然如虎添翼，但願能展翅高飛。筆者不才，見識淺陋，才疏學淺，對香港神學界各前輩若有冒犯衝撞之處，請不吝詳細指正。

---

1. 《哥林多前書》三章6節。